

# 论亚太大变局<sup>\*</sup>

吴心伯

**【内容提要】** 近年来,亚太地区进入了以相关国家力量对比变化和地区战略调整为主要特征的格局大变革时期。作者从环境变化、力量变化、趋势变化和秩序变化四个方面分析这一格局变动。在环境变化方面,亚太地理范围的扩大和行为体的增加、行为体之间互动方式的变化,使得亚太格局呈现出越来越显著的“多元复合结构”特征。在力量变化方面,中美、中日力量对比的变化具有重要意义,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日本从长期重视经济力量的作用转为愈来愈重视发挥安全力量的作用,而美国则从长期倚重安全牌转向更加重视经济牌。在趋势变化上,一方面,未来亚太地缘政治变化的关键取决于中美战略互动,而与中美战略冲突的可能性相比,中美走向战略妥协的可能性更大;另一方面,未来十年亚太地缘经济格局走向部分整合的可能性较高。就长期趋势来说,地缘政治变化将是温和的,而地缘经济演变将是强劲的,后者会更多地影响前者。在秩序变化方面,驱动亚太秩序演变的经济逻辑将进一步强化,霸权秩序的成分会进一步下降,秩序结构更加平面化,平等性上升,合作性增强,与地区格局的变化相适应,亚太秩序将呈现为多元复合的地区共同体形态。

**【关键词】** 亚太秩序;多元复合结构;地区共同体;力量转化

**【作者简介】** 吴心伯,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教授。(上海 邮编:200433)

**【中图分类号】** D8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9550(2017)

06-0032-28

<sup>\*</sup> 本文是笔者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美国的亚太布局与我国的亚太方略研究”(项目批准号:12&ZD083)成果的一部分。感谢《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匿名评审专家的意见和建议,文中错漏由笔者负责。

## 一 引言

冷战结束以来,亚太格局的变化经历了三个阶段,先是20世纪90年代美国推动的面向后冷战时期的格局重组,继而是21世纪第一个十年东亚合作所带来的格局重构,近年来则进入了以相关国家力量对比变化和地区战略调整为主要特征的格局大变革时期,这一变革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亚太地区最深刻、影响最深远的地缘政治与经济变动。以宏观视野观之,这一大变革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亚太在经济和政治上的崛起、全球政治经济中心向亚太的转移、相关国家的战略与政策演变、亚太区域合作的深化、国家间互动方式的变迁等。鉴于亚太在全球政治经济中重要性的上升,对亚太格局变化研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冷战结束后,特别是21世纪以来,学术界对这一课题给予了高度关注,产生了不少有价值的成果。<sup>①</sup>然而,近年来亚太格局变化步伐的加快和新的特征的出现,使得对这一课题的研究成为常说常新的话题。这就需要研究者在密切跟踪形势变化的基础上,通过系统而深入的研究,提出有价值的学理分析和有预见性的研判。

对国际格局的研究,应该关注行为体的数量和类型,它们的实力分配状况以及彼此之间的联系和互动方式等。<sup>②</sup>就亚太地区而言,当下格局的变化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地区环境变化,即亚太地理范围的扩大和行为体的增加以及行为体之间联系和互动方式的变化;二是力量变化,即主要行为体之间力量对比的变化以及力量运用

<sup>①</sup> 例如,近年来的研究成果(著作类)包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编著:《太平洋足够宽广:亚太格局与跨大秩序》,北京:时事出版社2016年版;吴心伯等:《转型中的亚太地区秩序》,北京:时事出版社2013年版;莫金莲:《亚太区域合作研究》,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耿协峰:《新地区主义与亚太地区结构变动》,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苏浩:《从哑铃到橄榄:亚太合作安全模式》,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曹云华:《探究亚太新秩序》,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Patrick Mendis, *Peaceful War: How the Chinese Dream and the American Destiny Create a New Pacific World Order*,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2013; Robert Haddick, *Fire on the Water: China, America, and the Future of the Pacific*, Annapolis: Naval Institute Press, 2014; Hugh White, *The China Choice: Why We Should Share Powe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Michael Yahuda,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f the Asia-Pacific*,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1; David Shambaugh, ed., *Power Shift: China and Asia's New Dynamics*,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5; G. John Ikenberry and Michael Mastanduno, e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the Asia-Pacific*,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3。限于篇幅,相关的中英文论文不逐一列举。

<sup>②</sup> 新现实主义理论在分析国际体系结构时主要关注“行为体的数量和类型以及它们的实力分配状况”。参见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著,阎学通、陈寒溪等译:《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11页。但笔者认为,仅仅关注行为体的数量和类型以及它们的实力分配状况只是一种静态层面的观察,还必须在动态层面上把握行为体彼此之间的联系和互动方式,静态与动态结合,才能更好地把握国际格局的状态。

方式的变化;三是趋势变化,即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发展的新动向;四是秩序变化,即规则与制度之争。从格局研究的角度看,环境要素涉及地区格局的基本架构,力量对比变化提供了地区格局变化的基本动力,趋势要素反映了变化的性质,秩序则体现了变化的最终形态,这几个方面相互联系,共同塑造了亚太地区格局变化的路径和结果。然而在现有研究成果中,往往关注其中之一二,却缺乏对这四者的综合研究,本文拟对上述四个方面作系统和深入的探讨,以期更好地揭示亚太格局变化的全貌。

## 二 多元复合结构

国际政治中地区的概念并不仅仅是地理上的,也是经济和政治上的。亚太作为一个地区出现在国际政治中是相当晚近的事(二战以后)。事实上,它作为一个地区的身份主要来自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考虑,而非来自基于同质性和共同目标的本土意识,并且这一身份仍处在演变和进一步界定的过程中。<sup>①</sup> 亚太地区最早是指“太平洋沿岸的亚洲”或“西太平洋地区”。<sup>②</sup> 随着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的成立和亚太经贸合作的推进,亚太地区成为一个环太平洋的概念,从西太平洋扩展到南太平洋(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和东太平洋(包括了南北美洲的太平洋沿岸国家,如秘鲁、智利、墨西哥、美国、加拿大等)。到了21世纪初,中国的崛起和东亚合作的开展使亚太更加充满活力和吸引力,亚太地位和重要性的提升使得南亚和中亚国家希望更多参与到亚太事务中。例如,印度提出了“向东看”的政策,越来越积极地谋求在亚太的地缘经济与政治利益。中亚国家通过开展与中国、日本等东亚国家的经济合作,越来越成为亚太经济板块的一部分。亚太地理范围的扩大反映了本地区重要性和辐射力的上升,也意味着更多的行为体参与到地区事务中来,地区的动力结构发生变化。

就国际政治的影响力而言,重要的不是行为体的数量,而是类型,即行为体在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由于国际格局是指“在一定时期内,由起战略支点作用的大国和国家集团所构成的一种相对稳定的国际关系结构和状态”,<sup>③</sup>因此,我们在考察亚太格局变化时,主要应关注那些能够影响地区力量结构和秩序结构的行为体,当前这样的行为体包括中国、美国、东盟和日本。中国的崛起、美国的战略调整、东盟的规范性效应、日本加紧迈向政治大国的步伐等,对亚太格局产生了重要但程度不一的影响。

① Michael Yahuda,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f the Asia-Pacific*, p.5.

② 林利民:《未来5—10年亚太地缘政治变局与中国》,载《现代国际关系》,2012年第4期,第9页。

③ 李义虎:《国际格局论》,北京:北京出版社2004年版,第39页。

中国的快速崛起及其更加积极有所作为的对外战略取向使之成为亚太格局变化的核心驱动力。中国既通过力量的增长改变地区权力结构,又通过其理念和政策行为塑造地区规范和机制,推动地区秩序的调整。总体而言,中国是地区格局中的关键行为者,具有在力量、制度和规范上塑造地区秩序的能力。得益于其所拥有的巨大发展潜力和不断提升的战略能动性,中国在亚太格局中的作用将会进一步增长。

美国是地区格局中的首要行为者和现行秩序的主要塑造者,但其力量和影响力优势呈相对下降趋势,为维护其主导地位 and 霸权利益,美国通过战略与政策调整来削弱和制衡中国的地区影响力,塑造对美有利的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格局。<sup>①</sup> 在可预见的将来,美国仍将是本地区最主要的行为者和秩序塑造者,但除非其力量优势的下降趋势得到扭转,否则其在地区格局中的作用将不可避免地持续下行。

东盟是地区格局中的重要行为者,并具有一定的塑造地区秩序的能力,这种塑造主要不是表现在改变地区权力结构上,而在于影响制度和规范的构建。东盟一方面通过自身的发展(如经济发展和共同体建设)提升整体实力,另一方面积极推动地区合作机制和规范建设,以发挥其在地区事务中的作用。东盟之所以能够在地区合作中发挥重要作用,除了其能动性外,还因为相关大国间(如中日、中美)的相互制衡以及部分地由于这种制衡而造成的大国对地区合作的引领作用的缺失。然而这种情况正在改变。从“一带一路”倡议到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中国正在活跃地推动各种形式的地区合作;美国在奥巴马执政时期也在“亚太再平衡”的大旗下积极推进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等地区合作构想。这无疑会挤压东盟在地区合作中发挥领导作用的空间。因此,虽然未来东盟仍旧是地区格局中的重要行为者,但其能否发挥更大的作用要取决于中国和美国的政策走向,也取决于东盟如何处理与它们的关系。<sup>②</sup>

日本在地区力量结构中占有重要位置,其战略走向也会影响到地区秩序的变化。当前日本正试图提升其军事能力,突破宪法对其拥有“集体自卫权”的限制,在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的政治与安全作用。但是由于日本的经济实力呈现长期下降趋势,兼之其作为美国霸权体系的一员,受美国的战略制约,日本在亚太地区既突破不了以中美两国为主导的力量结构的限制,也无法借助新的制度和规范来实质性改变现有秩

① 吴心伯:《奥巴马政府与亚太地区秩序》,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8期,第54—67页。

② 王森:《冷战后东盟推动下的东亚区域合作:进程、动因及限度》,载《战略决策研究》,2016年第1期,第18—41页;魏玲:《小行为体与国际制度》,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5期,第85—100页;任远喆:《亚太地区安全结构转型与东盟的角色》,载《国际安全研究》,2016年第2期,第33—49页。

序。<sup>①</sup> 因此,日本在地区格局中只是一个次要的行为者,其实质性作用乃在东盟之下。

在亚太这一不断扩展的大棋局中,除了关键行为者中国、首要行为者美国、重要行为者东盟以及次要行为者日本外,俄罗斯、印度、韩国也值得关注。虽然它们或因力量重心不在亚太(如俄、印),或因力量有限(如韩国),难以改变亚太的总体力量结构或地区秩序,但却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地区或次地区的力量对比和国际关系态势。例如,俄罗斯、韩国都能对东北亚的局势产生重要影响。因此,在亚太格局中,它们是中国等主要行为者竞相争取的对象,是地区格局演变的干预变量。

国际政治的变化既反映在力量对比和行为者的数量与质量上,亦反映在行为者之间联系和互动方式的变化上。在亚太地区,各行为体之间的经济与安全联系显著增强。经济上,由于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亚太及东亚经济合作的蓬勃开展,已经形成了围绕美、中、日三大经济体的密切的经济联系。安全上,美国主导的同盟体系正在朝“同盟+伙伴”的网络状结构发展,从而扩展了地区安全联系的纽带。东盟发起的地区安全对话与合作,从东盟地区论坛到东盟防长扩大会,增进了地区国家间的新型安全互动。中国倡导和推动的地区安全合作,从上海合作组织到湄公河流域执法安全合作机制,丰富了地区国家在传统和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建设性合作。

当前亚太不断增强的经济与安全联系呈现出三个显著特征。首先是二元格局的出现,即越来越多的地区国家在经济上加强与中国的联系的同时,在安全上保持和加强与美国的联系,这种“经济上靠中国、安全上靠美国”的政策取向导致本地区经济关系与安全关系明显分离的局面。<sup>②</sup> 其次是双重互动,即行为体之间在加强合作的同时,竞争关系也在加剧。这不仅表现在新常态下的中美关系中,也体现在中国与日本、东盟的关系中。<sup>③</sup> 最后是双向度博弈,即行为体之间的博弈同时在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两个维度展开。这种双向博弈最早体现在东盟与中日韩(“10+3”)的合作过程中,日本担心中国与东南亚关系的密切而急起直追,积极加强与东盟在政治安全与经贸领域的合作。随着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实施,中美在亚太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的竞争显现。前者主要体现在西太平洋、东南亚,后者主要表现为美国推动的 TPP 和中国推动的地区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亚投行等合作倡议。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将亚太格局的基本特征概括为“多元复合结构”。多元

① 实际上,日本近年来的战略动向是谋求固化美国主导的地区秩序。

② 周方银:《中国崛起、东亚格局变迁与东亚秩序的发展方向》,载《当代亚太》,2012年第5期,第4—32页。虽然周方银在这里关注的是东亚,但这一现象也适用于亚太。

③ 吴心伯:《新常态下中美关系发展的特征与趋势》,载《国际问题研究》,2016年第2期,第14—28页。中日竞争主要表现在东海、东南亚甚至南亚、中亚,而中国与东盟的竞争主要表现在南海问题上。

是指力量结构和重要行为者的数量。虽然亚太地区力量在各单元的分布并不均衡,美国总体优势明显,中国力量快速上升,但亚太力量结构既不是美国独霸下的单极,也不是中美两家主导下的两极,而是多个重要力量单元并存,多个重要行为体发挥作用。这里用“多元”而不是“多极”,主要是考虑到亚太各行为体并未以“诸侯割据”的方式分割地区体系,各占一方,而是大体上共处在一个地区体系中,相互之间建立了密切的联系。<sup>①</sup> 尽管由于历史的原因,美国主导的同盟体系仍然在本地区造成了成员间的某种区隔,但这种区隔并未导致亚太地区体系出现冷战式的分裂,也没有阻止同盟体系内外的国家间发展越来越密切的政治、经济和安全联系。“复合”主要是指行为体之间联系和互动的多样性——既有竞争,也有合作;在某些领域竞争,又在另外一些领域合作;甚至在同一领域中既有竞争,又有合作。

亚太地区环境的上述变化赋予地区格局以流动性、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这需要我们对力量、趋势和秩序的变化进行深入而细致的研究。

### 三 力量变化与力量转化

当下亚太地区最引人瞩目的力量变化是中美两国之间力量对比的变化。从经济总量看,200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是美国的11.7%,2015年则升至60.5%,<sup>②</sup>而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经济总量已在2014年超过美国。<sup>③</sup> 从军事力量看,2000年中国的国防支出为230亿美元,美国为3020亿美元,中国是美国的7.6%;到2015年,中国的国防支出已升至美国的36%。<sup>④</sup> 经过十余年的军事现代化建设,中国的军事能力有了显著提高,与美国的总体差距缩小。而在西太平洋地区,特别是在第一岛链之内,中美军事力量对比正在朝着对中国有利的方向发展。<sup>⑤</sup>

① 阿米塔夫·阿查亚在讨论新的世界秩序时使用了“多元(multiplex)”的概念。他认为,相对于“多极”,“多元”更关注主要行为者之间的相互依存。参见 Amitav Acharya, *The End of American World Order*, Cambridge and Malden: Polity Press, 2014, p.9.

② 据世界银行统计,200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为1.205万亿美元,美国GDP为10.285万亿美元;2015年,中国GDP为10.866万亿美元,美国GDP为17.947万亿美元(单位为现价美元)。参见 <http://data.worldbank.org.cn>, 访问时间:2016年9月18日。

③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统计,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2014年中国GDP为18万亿美元,美国为17.3万亿美元, [http://www.imf.org/external/datamapper/index.php? db](http://www.imf.org/external/datamapper/index.php?db), 访问时间:2016年9月18日。

④ 根据斯德哥尔摩和平研究所数据库2015年数据,中国的国防支出为2150亿美元,美国的国防支出为5960亿美元(单位为现价美元), <https://www.sipri.org/databases/milex>, 访问时间:2016年9月18日。

⑤ 胡波:《中美在西太平洋的军事竞争与战略平衡》,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5期,第64—84页; David C. Gompert, Astrid Stuth Cevallos and Cristina L. Garafola, *War with China: Think Through the Unthinkable*, Santa Monica: RAND Corporation, 2016.

宏观地分析中美经济和军事力量对比揭示了中美实力差距的缩小,而更细致地观察中美力量对比的变化则能展示中国在某些重要方面对美国的超越。2010年,中国超越美国成为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2013年,中国取代美国成为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中国超越美国成为全球增长的第一大引擎。更早之前,中国国际总储备(外汇储备、黄金储备、特别提款权等)也已超过美国。2006年,美国是全球127个国家最大贸易伙伴,中国则是70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到2011年,中国跃升为124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而以美国为最大贸易伙伴的国家数量下降为76个。<sup>①</sup>在周边和亚太地区,中国已是23个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国,这些国家包括:东北亚四国(日本、韩国、朝鲜、蒙古国)、东南亚八国(柬埔寨、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越南、缅甸)、中亚两国(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大洋洲两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南亚三国(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以及其他APEC成员国四国(智利、秘鲁、俄罗斯、美国)。美国作为第一大贸易伙伴的亚太国家仅有加拿大、墨西哥两国。<sup>②</sup>在投资方面,中国已是缅甸、老挝、柬埔寨、蒙古国等国第一大外来投资国,与美国尚有明显差距(美国是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新加坡、墨西哥等国的最大外来投资国)。<sup>③</sup>但总体而言,中国作为地区经济中心的地位更加突出。

中美力量对比的变化还体现在发展态势上。美国当前处在相对衰落态势。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国经济的内生性活力在下降,如美国经济迄今尚未实现强劲复苏,非农生产率年均增长率一直低于1%,远低于1998—2007年间的2.8%。<sup>④</sup>由于经济

① 甄炳禧:《21世纪:美国世纪还是中国世纪——全球视野下的中美实力对比变化分析》,载《学术前沿》,2015年第11期,第59—60页;《中国超过美国成为多数国家最大贸易伙伴》,http://finance.sina.com.cn/world/20121203/155413878413.shtml,访问时间:2016年9月20日。

② 数据来源说明:朝鲜的排名来自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网站(http://www.cccpit.org/Contents/Channel\_3590/2015/0605/465668/content\_465668.htm);缅甸的排名来自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2016-04/14/c\_1118621364.htm);哈萨克斯坦的排名来自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7-04/13/c\_1120803605.htm);老挝的排名来自中国驻老挝大使馆官网(http://la.mofcom.gov.cn/article/zxhz/201612/20161202078768.shtml);其他国家的排名来源于联合国贸发会议数据库的基础数据(https://comtrade.un.org/data/)并经笔者整理;东帝汶、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不丹、巴布亚新几内亚因无数据来源不在相应统计范畴内。上述网站访问时间:2017年5月9日。

③ 数据来源于以下网站: http://www.chinadevelopmentbrief.org.cn/news-19095.html; http://news.qq.com/a/20140822/006201.htm; http://www.ce.cn/xwxz/gnsz/gdxw/201609/12/t20160912\_15795548.shtml; http://www.cambodiainvestment.gov.kh/investment-environment/investment-trend.html; https://en.portal.santandertrade.com/establish-overseas; http://dfat.gov.au/trade/topics/investment/Pages/which-countries-invest-in-australia.aspx。上述网站访问时间:2017年5月10日。

④ 甄炳禧:《21世纪:美国世纪还是中国世纪——全球视野下的中美实力对比变化分析》,载《学术前沿》,2015年第11期,第58页。

结构性失衡、高赤字和高债务的压力、科技进步的放慢以及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等因素,美国经济长期增长的前景并不看好,其潜在经济增长率趋于下降,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会进一步走低。<sup>①</sup>此外,美国越来越严重的政治极化与社会分化等也掣肘了其发展。相比之下,中国仍处于崛起态势。虽然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放缓,但产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经济增长方式调整的力度增大,对科技进步和创新的支持力度上升,这些都为中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提供了保障。与美国相比,中国体制的执行力更强、运作的效率更高、释放的发展动能更大。从内政外交看,中国正在积聚越来越多的全球性大国的要素。

中美力量对比的变化具有重大意义。首先,与曾经追赶美国的苏联(政治军事大国)和日本(经济大国)不同,中国在政治、军事和经济等方面的实力地位都很可观,是一个与美国类似的全面型的大国,这样一个大国的崛起会对美国的地位以及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产生重大影响。其次,中国是美国霸权体系外的国家。二战以后,日本和联邦德国都实现了经济上的复兴,成为追赶美国的经济大国,但由于二者都是美国的盟友,战略上追随美国,尽管它们在经济上的崛起对美国构成了竞争,但在战略上却加强了美国主导的西方体系。中国作为美国霸权体系外的国家的崛起给该体系带来了压力,美国在思考如何应对中国崛起带来的挑战时,不得不考虑其对美国在亚太的同盟关系的影响。<sup>②</sup>最后,中国是一个亚洲国家。二战以后亚洲国际关系的特征之一就是依附性,即亚洲的国际格局由全球冷战格局界定,亚洲国家很大程度上依赖与域外国家(美国和苏联)的结盟。<sup>③</sup>20世纪70年代以后,日本通过贸易与投资促进了东亚国家间的联系,但在战略上继续依附美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东盟大力促进东亚地区合作,加强了东亚国家间的联系纽带,但美国与东亚关系的不平衡、不对称状态依旧。中国的崛起正在改变这一状况。2015年,东亚“10+3”的经济总量为18.81万亿美元,美国为17.95万亿美元,<sup>④</sup>至少在经济力量对比上,东亚与美国的不平衡得到了

① 参见甄炳禧:《从大衰退到新增长——金融危机后美国经济发展轨迹》,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83—86页;宋国友:《美国霸权衰退的经济逻辑》,载《美国研究》,2015年第1期,第54—65页;徐海燕、何建宇:《美国经济霸主地位的衰退趋势研究——基于GDP比重分析的视角》,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第108—115、135页。

② James Steinberg and Michael E. O'Hanlon, *Strategic Reassurance and Resolve: U.S.-China Relation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4, pp.19-21.

③ Muthiah Alagappa, ed., *Asian Security Practice: Material and Ideational Influence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Introduction," p.4.

④ 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2015年中国的经济总量为10.87万亿美元、日本为4.12万亿美元、韩国为1.38万亿美元、东盟为2.40万亿美元、美国为17.95万亿美元, <http://data.worldbank.org.cn/>, 访问时间:2016年9月19日。



改善。在关系格局上,作为奉行独立自主战略的大国以及地区经济中心,中国的崛起有助于提升亚洲的主体性,降低域外力量对地区事务的主导力。

亚太地区另一个重要的力量变化是中日力量对比的变化。从经济总量看,2010年,中国超过日本;2015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已是日本的2.6倍。2010—2015年间,中国的年平均增长率为7.8%,日本为0.6%,中国是日本的13倍。<sup>①</sup>虽然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在放缓,但未来仍能够保持远远高于日本的速度,这意味着中日之间经济实力的差距会进一步扩大。从两国在亚太地区的经济地位看,在APEC成员中,中国是16个经济体的最大贸易伙伴,日本只是一个经济体(文莱)的最大贸易伙伴;投资方面,中国内地是香港特别行政区最大的投资来源地,日本则是韩国、泰国的最大外来投资国。<sup>②</sup>总体上看,中国的地区经济中心地位比日本更加突出,而且这一优势还会随着中国比日本更强劲的经济增长而扩大。在军事上,中国拥有日本所没有的战略打击能力,而日本本来的优势是先进的海空力量,随着近年来重点建设海空军事能力的国防现代化进程的推进,解放军海空力量有了较快提升,如国产航母下水、新型核潜艇和轰—6K轰炸机、歼—20战斗机投入使用等,在西太平洋的活动范围也不断扩大,<sup>③</sup>中日海空力量对比正在发生对我有利的变化。

中日力量对比的变化也是影响深远的。首先,它改变了近代以来日本作为亚洲“优等生”的地位,也凸显了中日这两个亚洲大国的不同发展态势。其次,如同前面所阐述的,中国作为非美国同盟体系成员超越美国在本地区最主要的盟友日本,这对美国的同盟体系形成了冲击。最后,作为亚欧大陆国家的中国超越岛国日本,预示着亚洲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重心的转移。近代以来,欧美列强在东亚的存在以及日本成为亚洲最先进的国家,使得亚洲的地缘政治与经济重心集中在东亚的滨海地带,地区政治经济格局的特点是海重陆轻。而今中国作为新的地区力量中心,借助其陆海兼备的

① 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201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为6.04万亿美元、日本为5.50万亿美元;2015年中国为10.87万亿美元、日本为4.12万亿美元, <http://data.worldbank.org/cn/>, 访问时间:2016年9月19日。

② 《中国超过美国成为多数国家最大贸易伙伴》, <http://finance.sina.com.cn/world/20121203/155413878413.shtml>, 访问时间:2016年9月20日;《2014年朝鲜对外贸易同比增长3.7%》, [http://www.ccpit.org/Contents/Channel\\_3590/2015/0605/465668/content\\_465668.htm](http://www.ccpit.org/Contents/Channel_3590/2015/0605/465668/content_465668.htm), 访问时间:2017年5月9日;《新闻分析:政经利好助缅甸发展前景领跑全球》, [http://news.xinhuanet.com/2016-04/14/c\\_1118621364.htm](http://news.xinhuanet.com/2016-04/14/c_1118621364.htm), 访问时间:2017年5月9日;《专访:哈萨克斯坦全力支持将“一带一路”倡议变为现实——访哈萨克斯坦常驻联合国副代表鲁斯兰·布利特里科夫》,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7-04/13/c\\_1120803605.htm](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7-04/13/c_1120803605.htm), 访问时间:2017年5月9日;《老中双边贸易总额预计将超20亿美元》, <http://la.mofcom.gov.cn/article/zxhz/201612/20161202078768.shtml>, 访问时间:2017年5月9日;UN Comtrade Database, <https://comtrade.un.org/data/>, 访问时间:2017年5月9日。

③ 2015年3月,中国空军首次组织战机飞越巴士海峡赴西太平洋开展远海训练。在此之前,中国海军舰艇编队穿越第一岛链进入西太平洋演练已常态化。

广泛的地理联系,将重塑亚洲的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格局。<sup>①</sup>

在中美、中日力量对比发生重要变化的同时,这三个行为者的对外力量运用方式也在发生变化,中国、日本从长期重视经济力量的作用转为愈来愈重视发挥安全力量的作用,而美国则从长期倚重安全牌转向更加重视经济牌,由此出现了经济与安全手段相互转换的现象。导致该现象的出现有多种因素,但总体而言,丰富己方的政策手段、提高政策效用、适应变化的地区环境是导致力量转化的主要原因。

2013年10月,习近平在中央周边外交工作会议上强调:“推进同周边国家的安全合作,主动参与区域和次区域安全合作,深化有关合作机制,增进战略互信。”<sup>②</sup>近年来,中国更加积极地参与处理朝核问题和阿富汗问题,积极参与和推动地区安全合作,例如中国在2014年担任亚信峰会主席国之际,大力推动亚信进程,倡议要将其建设成为覆盖全亚洲的安全对话合作平台,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建立地区安全合作新架构。<sup>③</sup>此外,中国近年来也大力加强军事力量和安全能力建设,更加积极地维护在东海和南海的主权和海洋权益。尽管目前中国在周边的安全影响力与经济影响力仍不匹配,但经过最近几年的努力,中国的军事实力和安全能力得到提高,在周边的安全存在感增强,中国提供经济和安全公共产品的能力在提升。

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是凭借安全手段获得的。冷战时期,美国通过在亚洲建立同盟体系、部署前沿军事力量以及进行军事干预(朝鲜战争、越南战争)来确保其对地区事务的主导权。冷战结束后,美国重新界定安全同盟,使之适应新的地区安全环境,同时继续保持其在本地区的军事存在,并扩大与本地区有关国家间的安全合作,在同盟之外发展安全伙伴关系,以强化美国对地区安全事务的影响力。然而,随着东亚经济的快速发展、地区合作的推进以及中国成为地区经济中心,美国认识到它面临着被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边缘化的风险,而美国在亚太经济地位的弱化势必影响其政治地位和安全关系。<sup>④</sup>在此背景下,高度重视亚太地区的奥巴马政府于2011年秋正式出台了亚太再平衡战略,该战略的主旨就是通过加大美国对亚太的外交、经济和安全投入,巩固其在亚太的地位,促进其在该地区的利益,平衡、牵制中国力量和影

① 早在20世纪90年代,布热津斯基就意识到,“中国的各种选择已经开始影响到亚洲的地缘政治力量分布,而它的经济发展势头必将使它有更强的物质实力和更大的雄心”。参见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著,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译:《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9—60页。

② 《习近平:让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周边国家落地生根》, [http://news.xinhuanet.com/2013-10/25/c\\_117878944.htm](http://news.xinhuanet.com/2013-10/25/c_117878944.htm), 访问时间:2016年9月21日。

③ 《习近平:积极树立亚洲安全观 共创安全合作新局面》, [http://www.fmprc.gov.cn/web/ziliao\\_674904/zt\\_674979/ywzt\\_675099/2014zt\\_675101/yxhy\\_675105/zxxx\\_675107/t1158070.shtml](http://www.fmprc.gov.cn/web/ziliao_674904/zt_674979/ywzt_675099/2014zt_675101/yxhy_675105/zxxx_675107/t1158070.shtml), 访问时间:2016年9月21日。

④ 吴心伯:《美国与东亚一体化》,载《国际问题研究》,2007年第5期,第47—52页。

响力的上升。TPP 是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重要支柱。对美国来说,该协定不仅能给美国带来重要的经济利益,如扩大在亚太地区的市场准入、推动美国的经济增长、制定对美国有利的贸易与投资规则等,还会带来可观的地缘政治利益,如巩固美国主导的地区秩序、在亚洲维持对美有利的力量对比、影响中国的国内经济政策和在本地地区的外交关系等。<sup>①</sup> 正因为如此,时任美国国防部部长阿什顿·卡特(Ashton Carter)声称,对美国在亚洲的安全利益来说,国会批准 TPP 就如同在该地区增加一艘航母那般重要。<sup>②</sup> 在 TPP 谈判过程中,美国积极运用其政治和安全资源拉拢一些国家加入该协定的谈判并推进谈判进程,而一些国家如日本、越南等决定加入 TPP 也有重要的战略与安全考虑。<sup>③</sup> 奥巴马将 TPP 作为重要的地区战略抓手这一事实表明,美国认识到,在变化的地区环境中,美国需要丰富其政策工具,更多地将安全资源转化为地缘经济资源,以更好地实现美国在亚太的政策目标。“对美国来说,仅仅巩固其在安全领域的优势地位,而不能把这种优势转化到经济领域,对于强化其对东亚的主导这一战略目标来说是远远不够的。”<sup>④</sup> 尽管特朗普执政后宣布退出奥巴马政府竭力打造的 TPP,但现在断言 TPP 已经寿终正寝还为时过早。更重要的是,美国亚太政策越来越重视以安全手段塑造地缘经济格局,这一趋势无疑会对地区地缘经济环境产生重要影响。

日本在二战以后长期奉行重经济、轻安全的“吉田茂路线”,在成为经济大国后,日本通过贸易与投资在东亚建立了所谓的“雁行模式”,确立了地区经济中心地位,也扩大了其政治影响力。然而从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开始,日本加快谋求成为“正常国家”的步伐,对安全的关注和投入上升,但总体而言,日本的亚太政策仍以经济为重,通过发展双边经济关系与多边经济合作(如中日经济合作、“10+3”合作等)来谋取更多的经济利益。近年来,美国亚太战略调整、中国的快速崛起、日本国内政治保守化加剧,强化了日本走向政治和军事大国的趋势。安倍晋三第二次执政以来,积极推进大国战略,安全成为其推进这一战略的最主要的抓手,日本的亚太政策体现出明显的

① Michael J. Green and Mathew P. Goodman, “After TPP: The Geopolitics of Asia and the Pacific,”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38, No.4, 2016, pp.19-34.

② Secretary of Defense Ashton Cater, “Remarks on the Next Phase of the U.S. Rebalance to the Asia-Pacific,” <http://www.defense.gov/News/Speeches/Speech-View/Article/606660>, 访问时间:2016 年 9 月 22 日。

③ 蔡亮:《挑战与动因:日本参加 TPP 谈判的战略意图探析》,载《日本问题研究》,2012 年第 4 期,第 7—13 页;贺平:《日本参加 TPP 谈判的战略意图与政策论争》,载《日本学刊》,2012 年第 4 期,第 34—49 页;毕晶:《国际格局演变与越南加入 TPP 的外部因素分析》,载《国际经济合作》,2015 年第 2 期,第 57—60 页;李飞:《浅析越南加入 TPP 的利益考量》,载《东南亚南亚研究》,2016 年第 2 期,第 60—65 页。

④ 周方银:《中国崛起、东亚格局变迁与东亚秩序的发展方向》,载《当代亚太》,2012 年第 5 期,第 28 页。

从重经济向重安全转化、让经济为安全服务的趋向,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安倍把经济政策定位于服务国家安全”。<sup>①</sup> 安倍的安全牌主要包括以下方面:大幅改造并健全了“安全保障正常化”与“军事大国化”所需的法律体系;基本制定并完善了指导安全保障及防卫建设的战略和政策体系,特别是通过以解禁集体自卫权为核心内容的新安保法,使日本安全政策突破宪法限制,实现了二战后最大的一次“安全蜕变”;<sup>②</sup>建立了高效、集中的安全事务决策体系以及作战指挥与情报体系;大幅提高自卫队遂行远程作战、大型作战及联合作战的能力;强化日美同盟,深化和扩展日美军事合作;加强与澳大利亚、印度、越南、菲律宾等国的安全合作;将中国作为头号威胁,强化第一岛链军事建设,协助美国阻遏中国进入西太平洋,并积极介入南海问题,牵制中国在南海的行动等。<sup>③</sup> 日本亚太政策抓手从经济向安全的转化,既是日本国内政治演变的结果,也是日本保守势力对地区安全环境变化的反应,将是一个长期的趋势。而日本安全政策的重大变化、军事力量的提高以及在地区安全事务中作用的增大,不仅加剧了一些地区国家对日本走向的担忧,也在重新塑造日本的地区角色,使地区地缘政治环境更加复杂。

应该看到,中美日在推进各自亚太政策目标过程中,其力量手段的转换存在着一定的限度。中国对安全手段的强调更多地体现在非传统安全领域,而在传统安全领域,尽管中国的军事能力在提升,但运用军事力量解决争端的意愿并不高,中国在南海争端问题上坚持用外交手段解决就是最重要的例证。美国虽然越来越重视塑造地缘经济格局,但美国的总体经济实力在下降,相对于中国,其在地区经济中的分量会不断走低;美国在与亚太地区国家的经济互动中,越来越多的是“取”而非“予”;特朗普执政后表现出来的经济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倾向会进一步削弱美国在塑造地区经济格局中的作用。这些因素都会限制美国安全牌的转换作用。日本越来越注重在亚太地区发挥安全上的作用,但难以摆脱相对于中国的战略劣势地位,也在很大程度上继续受制于美国的地区政策。此外,虽然当前日本国内的政治思潮总体上偏向保守,反华情绪甚浓,但二战之后日本社会长期形成的反战和平思潮并未消失,仍会制约其对外政策走向。

① 刘云、慕阳子:《大国战略:安倍的经济与安全政策》,载《日本学刊》,2013年第2期,第56页。

② 杨伯江:《日本“安全蜕变”与中日战略博弈——2015—2016年日本形势回顾与展望》,载杨伯江主编:《日本蓝皮书:日本研究报告(2016)》,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2页。

③ 吴怀中:《战后日本安全政策的演变》,载《国际政治研究》,2015年第1期,第39—42页。

## 四 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

亚太地区力量对比的变化和相关国家的战略调整,使地区国际关系中的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因素更加突出,二者各自的演变和互动正在重塑地区格局与秩序的未来。

中国在力量上升的背景下,出于经济和安全利益的考虑,积极推进新的地缘政治战略目标。首先,加快建设海洋强国的步伐,积极维护和拓展海洋权益。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明确提出:“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发展海洋经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坚决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建设海洋强国。”<sup>①</sup>近年来,中国在东海方向采取了对钓鱼岛水域实施定期巡航、宣布设立东海防空识别区等措施;在南海方向采取了设立三沙市、加强海上巡逻监管和海上利益维护、加快海洋资源开发、推进岛礁建设等措施。与此同时,中国海军力量也有了较快的发展,突破第一岛链的能力提升,在西太平洋的活动范围扩大。二战以后,西太平洋地区基本上处在美国的战略控制之下,是美国太平洋海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冷战时期美国及其盟友精心构建的第一岛链成为遏制中国的重要战略屏障。作为一个传统的陆权国家,中国海上力量的增强和向西太平洋的积极拓展正在重塑这里的地缘政治格局。<sup>②</sup>其次,重视周边。2013年10月中央周边外交工作会议提出,要“努力使周边同我国政治关系更加友好、经济纽带更加牢固、安全合作更加深化、人文联系更加紧密”。<sup>③</sup>近年来,中国加大了对周边的投入,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大大推进了与东南亚、中亚、南亚国家的经济合作,通过上海合作组织、亚信峰会、湄公河流域执法安全合作机制、“阿中巴塔(阿富汗、中国、巴基斯坦、塔吉克斯坦)”四国军队反恐合作协调机制等加强了与周边国家的安全合作,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经济与安全合作水平显著提升。此外,中国还注意在周边打造一批战略支点国家,如印尼、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等,使其成为中国地区战略的重要依托。<sup>④</sup>长期以来,中国周边的地缘政治形势极为复杂。一些大国如美国、俄罗斯、印度都对中

<sup>①</sup>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http://news.china.com.cn/politics/2012-11/20/content\_27165856\_7.htm,访问时间:2016年10月26日。

<sup>②</sup> 罗伯特·罗斯认为,二战以后中国作为陆权国家、美国作为海权国家,这是东亚地缘政治的基本特征,这种地缘战略的错位有利于整个地区的稳定。参见 Robert Ross, “The Geography of the Peace: East Asia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3, No.4, 1999, pp.81-118。

<sup>③</sup> 《习近平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10/25/c\_117878897.htm,访问时间:2016年10月20日。

<sup>④</sup> 学术界关于周边支点国家的讨论,参见徐进、高程、李巍等:《打造中国周边安全的“战略支点”国家》,载《世界知识》,2014年第15期,第15—23页。

国周边国家拥有重要的影响力,有些周边国家是美国的盟友和安全伙伴,周边国家在地缘政治取向上各不相同,甚至相互冲突,地缘政治结构呈现出碎片化特征。同时,由于一些国家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矛盾和分歧,兼之受其他大国政策的影响,周边的地缘政治形势极不稳定,呈现出脆弱性特点。在此情况下,中国将更多的注意力和资源投向周边,努力打造可靠的地缘政治依托,将有助于整合周边地缘政治板块,稳定周边地缘政治形势,有效抵制一些大国利用周边对中国进行防范、牵制的企图。最后,加强与俄罗斯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协作。近年来,中国面临来自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压力,而俄罗斯在克里米亚事件后受到来自西方的制裁,战略重心整体上向亚太转移,这为中俄两国加强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提供了新的动力。2014年5月普京总统访华期间,双方发表了《中俄关于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新阶段的联合声明》,表示要“将中俄全面、平等、互信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提升至更高水平”。<sup>①</sup>中俄两国在亚太事务中的协调与合作显著增强。中俄海军每年在西太平洋举行联合军事演习。中俄支持对方举办二战欧洲和亚洲战场战胜德国法西斯主义和日本军国主义70周年庆祝活动,共同反对歪曲历史和破坏战后国际秩序的图谋。中俄在朝鲜半岛问题上保持良好的合作。俄罗斯支持中国不承认海牙临时法庭关于南海仲裁案的立场。中俄在亚太问题上加强合作与协调对本地区的地缘政治形势有重要影响。中国学者认为,“中俄战略协作是亚太地区安全与稳定的基石”。俄罗斯学者认为,“美日和俄中越来越成为东亚和亚太地区安全的两个‘轴心’”。<sup>②</sup>面对美国通过提升在亚太的军事存在、加强与扩展“同盟加伙伴”网络以牵制中国不断上升的力量和影响力,巩固其对地区事务的主导权的企图,面对日本奉行更加咄咄逼人的对华政策,中国加强与俄罗斯的战略协作无疑可以对美日起到重要的牵制作用。

美国亚太再平衡是外交、安全、经济多管齐下,政策手段中地缘政治因素突出。首先,美国加强了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如向新加坡派驻濒海战斗舰,在澳大利亚驻扎海军陆战队,在西太平洋更新武器系统以及计划在2020年将60%的海空军事力量部署到亚太地区等。其次,美国提升了与盟国的军事安全合作。2015年4月出台的新版《美日防卫合作指针》大幅扩大了日本自卫队对美国军事行动的支援范围,并允许美日在提升导弹防御能力、空间安全、网络安全等方面进行合作。2011年,美国与澳

① 《中俄关于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新阶段的联合声明》, [http://www.fmprc.gov.cn/web/ziliao\\_674904/1179\\_674909/t1157763.shtml](http://www.fmprc.gov.cn/web/ziliao_674904/1179_674909/t1157763.shtml), 访问日期:2016年10月20日。

② 李冠群:《中俄战略协作是亚太地区安全与稳定的基石》,载《光明日报》,2015年10月6日, [http://news.gmw.cn/2015-10/06/content\\_17253961.htm](http://news.gmw.cn/2015-10/06/content_17253961.htm), 访问时间:2016年10月21日;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中俄关系研究报告2014》,2015年4月,第4页。

大利亚在安全合作方面达成两个重要协议:一是将网络战纳入美澳共同防御条约,这是美国首次与北约以外的国家开展这种合作;二是同意美海军陆战队进驻澳大利亚北部的达尔文基地,这是美军首次正式驻军澳大利亚,被认为是30年来美澳同盟关系最大的提升。<sup>①</sup> 2014年4月,美国与菲律宾达成了为期十年的《加强军事合作协议》。根据这份协议,美军可更广泛地使用菲方一些指定的军事基地和设施,包括机场和港口;美军有权在这些地方新建设施;美军可在这些地方部署装备、战机和军舰等。这份协议为美军扩大其在东南亚的存在大开方便之门,也为提升美菲安全合作提供了便利。<sup>②</sup> 再次,美国改善与发展同本地区一些国家的关系,如加强与新加坡、越南、印度尼西亚、印度等在安全领域的合作,调整对缅甸的政策,改善美缅关系。通过这些举措,美国旨在扩展在本地区的“盟友+伙伴”网络,扩大其政治与安全影响力。最后,美国积极介入东亚的海上争端。美方明确表示钓鱼岛问题适用于《美日安保条约》,在南海问题上支持菲律宾和越南,美军在2015年发起了在南海的航行自由行动,挑战中国在南海的岛礁建设。美国这一系列举措的地缘政治目标,就是要在中国力量和影响力不断增强、在西太平洋越来越积极地维护和拓展自身利益的形势下,巩固美国在亚太的主导地位,平衡中国不断增强的军事实力,牵制中国的安全行为,削弱中国的地缘政治影响力。

在中国崛起、美国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背景下,一些地区国家在安全上奉行对华制衡政策,<sup>③</sup>从而使得亚太地区的地缘政治因素更加突出。近年来,日本、澳大利亚、菲律宾、越南、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印度等国纷纷加强与美国的安全合作,与此同时,它们也在加强彼此间的安全合作(如日本与澳大利亚、印度、越南、菲律宾的合作,澳大利亚与越南、菲律宾、新加坡的合作,越南与菲律宾、新加坡的合作,新加坡与菲律宾的合作等),以提升应对中国崛起的地缘政治合力。这些国家中,一些(如日本、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尼、印度)与中国有领土和海洋权益之争,它们的对华制衡行为既出于具体的利益关切,也在不同程度上考虑到力量对比变化对地区安全环境的影响,日本尤其如此;另一些(如澳大利亚、新加坡)则主要着眼于应对安全

① 吴心伯:《论奥巴马政府的亚太战略》,载《国际问题研究》,2012年第2期,第67页。

② 吴心伯:《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载《美国问题研究》,2015年特辑,第3页。

③ 参见周方银:《中国崛起、东亚格局变迁与东亚秩序的发展方向》,载《当代亚太》,2012年第5期,第15—16页;刘丰、陈志瑞:《东亚国家应对中国崛起的战略选择:一种新古典现实主义的解释》,载《当代亚太》,2015年第4期,第4—25页。周方银认为这些国家对华采取的是战略对冲,刘丰、陈志瑞则认为是对冲和制衡,笔者认为,从应对力量对比变化的角度看,这些国家的对华防范行为还是属于制衡(balancing)的范畴。

环境变化的不确定性,因为它们相信保持美国对地区安全格局的主导最符合其国家利益。<sup>①</sup>当然,这些国家对华制衡的力度是不一样的,其中以日本力度最强,越南、印度次之,其他国家又次之。这些国家在安全上的对华制衡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美国对地区事务的影响力,也使中国面临的地缘政治环境复杂化,并导致中国与一些国家之间的矛盾上升。

由此可见,当前亚太地区的力量对比变化和政策调整导致了多重地缘政治博弈的出现。力量上升的中国正在扩展地缘政治影响力,重塑周边的地缘政治结构,它将会改变和削弱美国对本地区地缘政治格局的主导。美国加大对亚太的资源投入,并提升了与本地区一些国家的安全联系,这有助于巩固美国的地缘政治地位,也加剧了中美地缘政治竞争态势。本地区一些国家针对中国崛起的制衡行为强化了美国对地区事务的影响力,同时使中国面临更加复杂的地缘政治挑战。总体而言,亚太地区的地缘政治竞争加剧,对抗的风险上升,格局调整的动能增大,地缘政治的消极态势突出。

展望未来,亚太地缘政治变化的关键取决于中美战略互动,而中美战略互动的走向存在两种可能性:中美走向冲突和中美走向妥协。中美走向冲突的可能性较低,原因有以下三点:第一,两国之间形成了紧密的经济联系,冲突会给两国的利益带来巨大损失,这无疑会影响双方领导人的决策偏好。第二,中国强大的且仍在快速增长的军事能力(包括拥有可靠的对美核威慑力量),使得美国在对华冲突中不可避免地要付出巨大代价,任何一个理性的美国领导人都难以轻易做出与中国交战的决定。第三,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地缘政治目标有限,着眼于维护和巩固在周边的安全和发展利益,不追求在整个太平洋的主导地位,也无意将东亚变成自己的势力范围,将美国排除在外。<sup>②</sup>因此,中国不对美国的核心和重大利益构成威胁,中美矛盾与冷战时期的美苏矛盾和二战之前的美日矛盾是不一样的。

相比之下,中美走向战略妥协的可能性更大,因为中美在西太平洋的力量对比将越来越有利于中国。左希迎认为,“随着中国实力的进一步扩大,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就会达到一个临界点。在这个临界点以后,美国将无力支撑其在亚太的战

<sup>①</sup> Adam P. Liff and G. John Ikenberry, “Racing Toward Tragedy? China’s Rise, Military Competition in the Asia Pacific, and the Security Dilemm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39, No.2, 2014, pp.52-91.

<sup>②</sup> 近年来,中国领导人一再强调“宽广的太平洋有足够空间容纳中美两个大国”,既是提醒美国要以开放的心态看待中国的崛起,也是向美国表明中国在亚太的战略意图。参见《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奥巴马开始举行中美元首会晤》, [http://www.fmprc.gov.cn/web/ziliao\\_674904/zt\\_674979/ywzt\\_675099/2013nzt\\_675233/xjpdwfw\\_675267/zxxx\\_675269/t1048747.shtml](http://www.fmprc.gov.cn/web/ziliao_674904/zt_674979/ywzt_675099/2013nzt_675233/xjpdwfw_675267/zxxx_675269/t1048747.shtml), 访问时间:2016年10月28日。



略,并转入战略收缩的阶段”。<sup>①</sup> 美国在亚太的战略收缩将伴随着与中国的战略妥协。这种战略妥协可以有两种形式:消极的和积极的。消极的战略妥协是美国鉴于中国力量增长的现实,接受中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战略进取和影响力的扩大,不挑战中国在该地区的相对优势地位(如中国在第一岛链内的战略优势),并对美国的政策做出相应调整。但是由于中美没有就这个问题达成正式或明确的战略谅解,双方都对对方的战略意图怀有疑虑,在实际的战略互动中相互防范、相互制衡的因素突出,导致双边战略关系的稳定性和可预期性不强。积极的妥协则是双方通过战略沟通,清晰地向对方传达己方的战略意图和对对方的战略预期,并就双方具体的安全行为达成一致。中方既向美方表达自己在东亚和西太平洋地区维护和巩固安全与发展利益的决心,并展示其能力;又向美方表明目标的限度,以有效安抚美国。美方则基于西太平洋力量变化的现实,明确承认和接受中方战略进取所带来的变化,相信中方关于其有限意图的保证。在这一战略谅解的基础上,双方都对各自的安全行为做出相应的调整,以体现这一谅解的精神,证明各自意图的真实性和承诺的可信度。这样一来,中美战略互动中相互防范、相互制衡的因素就会显著减弱,双边战略关系具有稳定性和可预见性。<sup>②</sup>

随着中美战略妥协的达成,亚太地区其他国家的对华制衡行为会出现分化,一些国家在其具体的国家利益没有受到中国挑战或严重威胁的情况下会放弃制衡,另外一些则会降低制衡的力度,转而通过与中国发展积极的经济、外交甚至安全合作来规避或化解来自中国的安全压力,还有个别国家(如日本)可能会加大对华制衡行为。无论如何,中美战略妥协的达成将使反映亚太地区新的力量对比的地缘政治格

① 左希迎:《美国战略收缩与亚太秩序的未来》,载《当代亚太》,2014年第4期,第16页。

② 近年来,一些有远见的美国分析人士都提出了中美战略妥协(谅解)的问题,参见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著,洪漫等译:《战略远见——美国与全球权力危机》,北京:新华出版社2012年版;James Steinberg and Michael E. O'Hanlon, *Strategic Reassurance and Resolve: U.S.-China Relation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2014; Lyle J. Goldstein, *Meeting China Halfway: How to Defuse the Emerging US-China Rivalry*,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2015; Michael D. Swaine, "Beyond U.S. Predominance in the Western Pacific: The Need for a Stable U.S.-China Balance of Power,"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April 20, 2015, <http://carnegieendowment.org/2015/04/20/beyond-american-predominance-in-western-pacific-need-for-stable-u.-s.-china-balance-of-power>, 访问时间:2017年5月10日。布热津斯基指出,“美国与亚洲的战略对接应该经过仔细的调整,目的是要培育与中国的合作关系”;“为了增加中国成为全球主要伙伴的可能性,美国应该默许中国在亚洲大陆拥有突出的地缘政治地位,默许中国成为主导亚洲经济的大国”。他强调,美中之间有三个敏感问题需要和平地解决,即美国在中国领海边缘进行军事侦察的问题以及美国海军在国际水域巡航时部分进入中国专属经济区;两国的军备发展问题;台湾问题。美国学者史文(Michael Swaine)认为,要在西太平洋地区从美国的海上主导转向稳定的中美均势,需要两国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达成谅解,包括朝鲜半岛、台湾问题、东海和南海的海上争端、第一岛链内的军事能力、两国的核战略等。

局呈现出来。在这个新格局中,中国在周边地区会拥有更大的影响力,美国的主导能力下降,但仍将是维持新格局的重要行为者,其他国家一方面要适应中国新的地缘政治角色,同时还会或多或少保持对华制衡行为,但不会带来严重的地缘政治紧张或不稳定。

如同地缘政治形势一样,亚太地区的地缘经济形势也在发生重大变化。事实上,在后冷战时代,亚太的地缘经济格局变化比地缘政治变化更加深刻。20世纪90年代,美国在塑造亚太地缘经济格局中发挥主导作用,其抓手就是1989年成立的APEC。克林顿政府利用该组织来达到三个目标:推动贸易与投资自由化,为美国的商品和服务拓展亚太市场;预防东亚形成以日本为中心的地区贸易集团,阻止日本在经济上与美国分庭抗礼;通过APEC的议程来影响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的全球谈判议程。在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后,APEC风光不再,东亚国家转向加强东亚地区经济合作,此后十年是东亚合作的黄金时代。“10+3”、“10+1”合作大大深化了东亚国家在金融、贸易、投资等领域的合作,东亚经济格局朝着一体化的方向迈进,而东盟也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领导者的角色。由于美国基本上没有参与这一进程,亚太地缘经济版图的东亚特征突出,太平洋特征弱化。

2010年之后,亚太地缘经济格局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势。一方面,奥巴马政府在“亚太再平衡”的政策框架下,积极推进TPP谈判。TPP的地缘经济目标就是要重塑美国的亚太经济中心地位,削弱中国在地区经济中的影响力,牵制东亚合作的发展。尽管TPP谈判达成协议的时间一拖再拖,特朗普执政后宣布美国退出TPP更使该协定的未来进入未定之天,<sup>①</sup>但美国主导和推进这一谈判进程本身就产生了重要的地缘经济影响,它不仅凸显了美国在亚太的经济主导地位,也弱化了东亚合作的发展势头。另一方面,中国自2013年以来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推动设立亚投行,并积极参与RCEP和中日韩自贸区的谈判。中国这些举措的地缘经济目标就是要巩固与亚欧国家尤其是周边国家的经济联系,为转型中的中国经济发展拓展新的空间、打造新的平台,同时也是要保持东亚地区经济合作的势头。“一带一路”建设所取得的进展、亚投行的顺利成立,显示了中国在推动新的地区合作倡议方面的领导力和行动力。这样,在亚太地缘经济格局中,中国和美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同时成为重要的引导者和塑造

<sup>①</sup>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陈文玲认为,从长期看,TPP面临两种前景。第一种前景是短期内将其“封冻”起来,长期则可能将其重新包装成另一个协议;第二种前景是彻底推翻TPP,美国转向与各主要国家进行双边谈判达成贸易和投资协定。参见汪仲启:《世界经济将在颠簸和纠结中前行》,载《社会科学报》,2017年3月9日。实际上,还存在第三种可能性,就是在日本、澳大利亚等国的推动下,没有美国参加的TPP先生效,而美国则有可能在将来重新加入。

者。更重要的是,这两大经济体各自推进的地缘经济构想相互竞争的态势也很明显。美国主导的 TPP 谈判没有中国参加,奥巴马多次表示打造 TPP 就是为了不让中国制定经济规则。<sup>①</sup> 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是开放性的,但为“一带一路”提供融资的亚投行则遭到奥巴马政府的反对,认为它对美国和日本主导的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构成了竞争。此外,中国积极推动的 RCEP 也没有美国参与,其所要加强的东亚合作正是美国所不希望看到的。

有趣的是,面对亚太中美地缘经济竞争的张力,一些东亚国家并没有像在安全上那样选边站,通过靠拢美国来制衡中国,而是选择同时加入中美两国的相关倡议。<sup>②</sup> 例如,在 2016 年 2 月签署 TPP 协定的 12 个成员中,除了美国、加拿大、墨西哥、智利、秘鲁这五个美洲国家外,其他七个国家(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文莱、马来西亚、新加坡、越南)也加入了 RCEP 谈判,这七个国家中除日本外还加入了亚投行,日本则加入了中日韩自贸协定谈判。这表明,在地缘经济方面,亚太多数国家同时看好中国和美国,希望能够同时发展与二者的合作并获利。事实上,日本、越南等决定加入 TPP 还有重要的地缘政治考虑,而许多国家加入 RCEP 和亚投行则主要出于经济考虑,因此实际上亚太地区成员在地缘经济上更看好中国一些。

这一现象对我们理解亚太地缘经济的演变趋势具有重要意义。一般来说,亚太地缘经济的未来有三种可能性。一种是整合型。不论是 TPP 还是 RCEP,最终都整合到亚太自贸区的框架中。2014 年在北京召开的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宣言中提出了“在本地区现有自贸安排基础上尽早建成亚太自贸区”的目标。<sup>③</sup> 中国是这一愿景的积极推动者,中方主张 TPP 和 RCEP 应该相互促进,为实现亚太自贸区这一共同目

---

① Kai Ryssdal, “The Full Interview: President Obama Defends the TPP,” October 6, 2015, <http://www.marketplace.org/2015/10/06/economy/president-obama-talks-trade/full-interview-president-obama-defends-tpp>, 访问时间:2016 年 11 月 1 日; “President Obama: The TPP Would Let America, Not China, Lead the Way on Global Trade,” May 2, 2016,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opinions/president-obama-the-tpp-would-let-america-not-china-lead-the-way-on-global-trade/2016/05/02/680540e4-0fd0-11e6-93ae-50921721165d\\_story.html?utm\\_term=.d51e9b1438d6](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opinions/president-obama-the-tpp-would-let-america-not-china-lead-the-way-on-global-trade/2016/05/02/680540e4-0fd0-11e6-93ae-50921721165d_story.html?utm_term=.d51e9b1438d6), 访问时间:2016 年 11 月 1 日。

② 当然也要看到,近年来,日本在东南亚、南亚以及中亚与中国积极开展地缘经济竞争,这里既有经济利益考虑,也有战略上的考虑。

③ 《北京纲领:构建融合、创新、互联的亚太——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二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宣言》,2014 年 11 月 11 日, [http://www.fmpcc.gov.cn/web/ziliao\\_674904/zt\\_674979/ywzt\\_675099/2014zt\\_675101/fzshyjsxghd\\_675199/zxxx\\_675201/t1209862.shtml](http://www.fmpcc.gov.cn/web/ziliao_674904/zt_674979/ywzt_675099/2014zt_675101/fzshyjsxghd_675199/zxxx_675201/t1209862.shtml), 访问时间:2016 年 10 月 28 日。

标做出贡献。<sup>①</sup>这样一来,亚太地缘经济走向深度一体化,竞争大为削弱甚至消失。另一种是部分整合型。由于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方式的差异,未来的亚太自贸区只能作为最大公约数支撑地区经济合作,但不能取代所有现存的经济合作安排,特别是中美两国会各自保留一些它们先前分别达成的合作机制,这些安排符合各自的比较优势,如 RCEP、TPP 等,<sup>②</sup>这意味着地缘经济竞争仍将存在,但力度减弱。在此情况下,亚太地缘经济格局将是合作与竞争并存,而长远来看,仍有可能在时机成熟时走向完全整合。还有一种可能是竞争性共存。由于国内利益的牵制和地缘政治的考虑,中美两国都不愿意在合作规则上做出重大妥协,建立亚太自贸区的目标难以实现,中美这两大经济体仍执着于各自已有的合作安排,其他国家则两边参与,同时获利。尽管在这种情况下,中美地缘经济的竞争将会持续甚至加剧,但亚太地缘经济格局也不会走向完全割裂,这不仅因为中美两国之间已经形成了密切的经济联系,这种联系在未来还会进一步扩展,而且由于中美之间各种形式的双边与多边合作安排的存在将维系和深化这两大经济体之间的合作。

总体上看,未来十年亚太地缘经济格局走向部分整合的可能性比较大。与此同时,随着中国经济体量的进一步上升和地区合作的拓展,中国的地缘经济影响力将会继续增强。美国在合作规则制定上的影响力仍然会优于中国,但其地缘经济影响力整体会上会相对下降,同时美国地缘经济政策中谋求削弱和排挤中国的目标则难以达到。未来的亚太自贸区何去何从,将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中美两国地缘经济影响力的消长。

那么,在亚太地区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因素同时突出的背景下,二者之间的互动又会呈现什么样的景象?

从博弈论的角度分析,如下表所示,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的互动可以有四种形式:(1)正向互动,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都推动地区合作;(2)负向互动,地缘政治和地缘

<sup>①</sup> 《2016年5月3日外交部发言人洪磊主持例行记者会》, [http://www.fmprc.gov.cn/web/fyrbt\\_673021/jzhsl\\_673025/t1360329.shtml](http://www.fmprc.gov.cn/web/fyrbt_673021/jzhsl_673025/t1360329.shtml), 访问时间:2016年11月2日。2016年11月20日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四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通过的《亚太自贸区利马宣言》强调,“我们再次承诺亚太自贸区应建立在正在开展的区域安排基础上,包括通过《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等可能路径加以实现”。参见 <http://www.fmprc.gov.cn/web/zyxw/t1416939.shtml>, 访问时间:2017年5月16日。

<sup>②</sup> 王辉耀、苗绿、方挺等在《FATTP:后 TPP 时代的最佳选择?》一文中提出“在 RCEP 与 TPP 之上建立一个伞状结构的 FTAAP”的设想,认为该路径将形成 RCEP、TPP、FTAAP 并存格局,FTAAP 的自由化程度将介于 RCEP 和 TPP 之间,双方成员必须在服务贸易、知识产权等领域统一标准,在政府采购、国有企业、劳工标准、环境标准等内容上弥合差异,在原产地规则上达成共识等。他们认为,相比其他的路径,“伞状结构”具有更高的可行性。参见王辉耀、苗绿、方挺:《FATTP:后 TPP 时代的最佳选择?》,载《社会科学报》,2017年1月26日。

经济都推动地区竞争;(3)地缘政治主导地缘经济(含合作与竞争);(4)地缘经济主导地缘政治(含合作与竞争)。

表 1 亚太地区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的互动

	地缘经济整合	地缘经济竞争	地缘政治合作	地缘政治竞争
地缘政治合作	正向互动	地缘政治主导地缘经济(合作型)	—	—
地缘政治竞争	地缘政治主导地缘经济(竞争型)	负向互动	—	—
地缘经济整合	—	—	正向互动	地缘经济主导地缘政治(合作型)
地缘经济竞争	—	—	地缘经济主导地缘政治(竞争型)	负向互动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结合亚太地区国际政治经济的现实来看,如前所论,地缘政治演变主要表现为中美冲突和中美妥协两种可能性,地缘经济演变主要表现为整合(包括完全整合与部分整合)与竞争两种可能性。这样,上述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互动的四种形式具体表现如下:(1)正向互动,中美战略妥协和地缘经济整合(部分或全体)的趋势同时发展,相互促进,亚太在政治和经济上都朝着合作的方向演变,这有助于提升地区的稳定与繁荣。(2)负向互动,中美地缘政治冲突和地缘经济竞争的趋势并行,相互强化,亚太的两极化趋势发展,地区的稳定与繁荣受到挑战。(3)地缘政治主导地缘经济。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带有制衡中国的地缘政治特征,因此其亚太经济政策也具有制衡中国的意味,这典型地表现在 TPP 上。但是随着特朗普执政,美国亚太政策(包括对华政策)的地缘政治成分呈现下降趋势,<sup>①</sup>美国的亚太战略有可能朝着中美妥协的方向发展,而随着特朗普宣布美国退出 TPP,美国在亚太开展地缘经济竞争的态势明显减弱。(4)地缘经济主导地缘政治。奥巴马执政时期亚太地区的地缘经济竞争态势凸显,它强化了地缘政治的竞争色彩。但是如果未来地缘经济走向整合(包括部分整合),将推动中美走向战略妥协。

那么亚太国际政治经济演变的前景究竟会如何?前面的分析认为,未来中美走向战略妥协的可能性和亚太地缘经济格局走向部分整合的可能性都比较大,这意味着地

<sup>①</sup> 吴心伯:《特朗普执政与中美关系走向》,载《国际问题研究》,2017年第2期,第24—25页。

缘政治与地缘经济会呈现正向互动。因此,我们有理由对亚太地区国际格局的未来感到乐观。一方面,长远而言,最近一段时期(2010—2016年)亚太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竞争态势很可能只是阶段性的,是在地区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过程中相关行为者战略与政策调整的结果,这一调整还会继续下去,并将越来越反映地区力量对比变化的大趋势,而中国力量和影响力的上升是这个趋势的主要特点。另一方面,中国在亚太的地缘政治目标的有限性,决定了中美地缘政治竞争的有限性,亚太地区地缘政治变化的步伐将是渐进的,力度将是温和的。与此同时,亚太地区经济发展的活力(特别是中国经济在新常态下的稳健增长)、世界三大经济体的汇聚以及亚太地缘经济整合给各方带来的巨大利好,决定了未来亚太地缘经济演变的力度将是强劲的。就长期趋势来说,温和的地缘政治变化和强劲的地缘经济演变相互作用,后者会更多地影响前者,并对地区格局的塑造发挥更大的作用。

## 五 秩序与规则

与欧洲不同,冷战后亚太地区的秩序变化是渐变而非突变。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是推动地区秩序演变的主要力量。到了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东盟通过积极推动地区合作而成为地区秩序的重要塑造者。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力量上升和战略上积极进取的中国成为塑造地区秩序的关键力量。中国、美国、东盟三个行为者各自对亚太秩序的形态和规则持有不同的偏好与主张,使得未来地区秩序的演进呈现出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中国主张的亚太秩序观,<sup>①</sup>首先是以经济为基本逻辑,即通过各国的经济发展和地区经济合作推动地区秩序的构建或重构,该秩序反过来有助于经济发展,有利于地区成员间的经济合作。其次是一体性与包容性,亚太地区秩序应该涵盖整个环太平洋地区的国家,不能出现割裂的或排他的地区秩序安排,不能因政治、经济或文化原因而将一些地区成员排斥在外。再次是平等性。该秩序不是等级结构,而是平面结构,所有成员地位平等,没有高下之分。当然由于各国力量和参与地区事务的意愿差异,它

<sup>①</sup> 参见《中国的亚太安全合作政策》白皮书, <http://www.fmprc.gov.cn/web/zyxw/t1429766.shtml>, 访问时间:2017年5月25日;习近平:《共建面向未来的亚太伙伴关系——在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二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的开幕辞》, [http://www.fmprc.gov.cn/web/ziliao\\_674904/zt\\_674979/ywzt\\_675099/2014zt\\_675101/fzshyjxghd\\_675199/zxxx\\_675201/t1209597.shtml](http://www.fmprc.gov.cn/web/ziliao_674904/zt_674979/ywzt_675099/2014zt_675101/fzshyjxghd_675199/zxxx_675201/t1209597.shtml), 访问时间:2017年5月22日;《共建面向未来的亚太伙伴关系——亚太经合组织成立25周年声明》, [http://www.fmprc.gov.cn/web/ziliao\\_674904/zt\\_674979/ywzt\\_675099/2014zt\\_675101/fzshyjxghd\\_675199/zxxx\\_675201/t1209861.shtml](http://www.fmprc.gov.cn/web/ziliao_674904/zt_674979/ywzt_675099/2014zt_675101/fzshyjxghd_675199/zxxx_675201/t1209861.shtml), 访问时间:2017年4月12日。

们在这个秩序中所处的位置会有所不同,有些处于秩序的中心,有些处于外围,还有些介于二者之间。最后是多极和多元特征。支撑地区秩序的力量结构是多极而非单极,秩序的形态具有多元性而非单一性,不同的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模式和文化能够共存。总体而言,中国所主张的亚太地区秩序是一种以经济为导向、以伙伴关系为特征的松散多元的地区共同体。<sup>①</sup> 经济上的亚太自由贸易区和多层次、复合型的地区安全架构将是该秩序的主要制度支撑。

力量塑造秩序,秩序体现规则。中国主张的亚太地区秩序主要包含以下规则:发展、伙伴关系、平等、协商一致等。中国认为,“实现共同发展是维护和平稳定的根本保障,是解决各类安全问题的‘总钥匙’”。<sup>②</sup> 发展既是构建地区秩序的重要目的,也是秩序主要的功能体现。伙伴关系是亚太和平稳定的政治根基,中国主张“结伴而不结盟”,不仅因为结盟政治是旧时代(冷战及以前)的国际政治行为,更因为结盟将导致亚太地区的对抗和分裂,不利于实现亚太秩序的一体性和包容性。伙伴关系还反映了中国对多边主义的偏好,因为在多边主义的合作实践中,参与者之间是一种真正的伙伴关系。中国对平等的强调,不仅基于自身屈辱的近代历史经历,更由于这样的事实,即现行的亚太秩序在很大程度上为美国所塑造和主导,亚洲国家和太平洋国家(美国)在这个秩序中的地位是不平等的、所发挥的作用是不平衡的。因此中国所期待的新的亚太秩序不仅能够确保各成员国平等参与地区事务,也能促进亚洲国家与美国之间更加平衡的互动。协商一致是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的普遍偏好,体现了亚洲国家对主权的重视和不喜欢强制性的制度安排的政治文化,同时也反映了亚洲的多样性和普遍存在的弱势心理(相对于美国而言)特征。

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美国主张的亚太秩序以安全为基本逻辑。第一,历史地看,二战后美国在塑造地区秩序时安全是最主要的抓手;现实地看,安全是美国的力量优势所在,一些亚太国家在安全上需要以不同方式借助美国,因此以安全作为秩序的基本逻辑最符合美国的利益。第二,美国希望把其主导的亚太双边同盟体系作为地区秩序的基础。在安全逻辑下,美国缔造的同盟体系是亚太地区历史最悠久、制度安排

<sup>①</sup> 例如,习近平在2013年10月召开的中央周边工作会议上提出要强化周边命运共同体意识。参见《习近平:让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周边国家落地生根》,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10/25/c\\_117878944.htm](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10/25/c_117878944.htm), 访问时间:2017年4月20日。2014年4月,李克强在博鳌论坛2014年年会开幕式上提出要结成亚洲利益共同体、形成亚洲命运共同体、打造亚洲责任共同体。参见李克强:《共同开创亚洲发展新未来——在博鳌亚洲论坛2014年年会开幕式上的演讲》,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4-04/10/c\\_1110191764.htm](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4-04/10/c_1110191764.htm), 访问时间:2017年4月20日。

<sup>②</sup> 《中国的亚太安全合作政策》白皮书, <http://www.fmprc.gov.cn/ce/ceph/chn/zgxw/t1429980.htm>, 访问时间:2017年5月20日。

最严密、运作最为常态化的安全架构,以它作为地区秩序的基础毫无疑问将确保美国在该秩序中的主导地位。第三,秩序的等级结构。在这个结构中,各国的地位视其与美国的亲疏而定,美国作为主导者高高在上,其次是日本、澳大利亚等盟国,再次是美国需要发展合作关系的伙伴,如新加坡、越南、印度尼西亚等,最后是具有合作者与竞争者双重身份的中国。第四,排他性。美国的亚太秩序观以安全为构建逻辑、以同盟体系为主要架构,因此该秩序就具有选择性,不包括那些被美国视为异类的国家,如朝鲜或民主化之前的缅甸。第五,单极和单元特征。美国所偏好的地区秩序是美国作为单一的主导者。虽然在冷战时期全球和亚太格局具有鲜明的两极特征,但在后冷战时代,美国谋求单极世界,不允许任何其他国家挑战美国的主导地位,在中国崛起的亚太地区尤其如此。美国不仅要主导秩序,也要垄断规则的制定。<sup>①</sup>与此同时,美国也希望这个秩序内的国家在政治制度、价值观以及经济发展模式上向美国看齐,使秩序形态呈现单一色彩。由此可见,美国所偏好的亚太秩序是以安全为导向、以同盟关系为核心、以美国为主导的安排,本质上是一种霸权秩序,是“美国治下的和平”。其制度依托是美国的“同盟+伙伴”架构和奥巴马政府推动的 TPP 安排。

美国主张的亚太秩序规则主要包括安全、美国主导、结盟、有限的多边主义等。安全是秩序建构的基本逻辑,维护美国及其盟友的安全利益也是该秩序的主要功能。美国主导首先体现在现存的地区秩序中,在中国力量崛起和东盟规范性崛起的大背景下,美国会继续谋求维护和巩固其主导地位,即使在美国逐渐失去力量优势的情况下,它也会努力确保对规则的主导权。双边同盟体系是美国在亚太地区最主要的战略资产,也是其构建地区秩序的重要抓手。实际上,美国心仪的地区秩序就是其同盟体系的放大版。<sup>②</sup>因此,结盟也就成为美国构建地区秩序的重要原则。在后冷战时代,美国在克林顿政府和奥巴马政府时期倡导并参与了一些多边主义的合作,如经济上的 APEC、TPP,政治和安全上东盟发起的东盟地区论坛、东盟防长扩大会、东亚峰会等。不过美国在亚太的多边主义实践是有限的,这在安全领域尤为明显,因为在美国看来,

<sup>①</sup> Kai Ryssdal, “The Full Interview: President Obama Defends the TPP,” October 6, 2015, <http://www.marketplace.org/2015/10/06/economy/president-obama-talks-trade/full-interview-president-obama-defends-tpp>, 访问时间:2016年11月1日; “President Obama: The TPP Would Let America, not China, Lead the Way on Global Trade,” May 2, 2016,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opinions/president-obama-the-tpp-would-let-america-not-china-lead-the-way-on-global-trade/2016/05/02/680540e4-0fd0-11e6-93ae-50921721165d\\_story.html?utm\\_term=.d51e9b1438d6](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opinions/president-obama-the-tpp-would-let-america-not-china-lead-the-way-on-global-trade/2016/05/02/680540e4-0fd0-11e6-93ae-50921721165d_story.html?utm_term=.d51e9b1438d6), 访问时间:2016年11月1日。

<sup>②</sup> G. John Ikenberry and Michael Mastanduno, “Images of Order in the Asia-Pacific and the Role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G. John Ikenberry and Michael Mastanduno, e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the Asia-Pacific*, pp.423-424.



多边安全合作只是传统的双边安全合作的一个补充。<sup>①</sup>

东盟主张的亚太地区秩序的基本逻辑是安全与经济。在冷战时期,东盟的合作主要关注安全。<sup>②</sup> 冷战结束后,东盟担心东南亚出现力量真空,积极倡导以东盟地区论坛为平台的多边安全合作。在亚洲金融危机后,东盟的关注更多地转向经济,积极推动以“10+3”为框架的东亚经济合作。因此,东盟对地区秩序的第一个偏好是安全与经济成为两大支柱。第二,东盟希望自身成为地区秩序的中心。“东盟通过参与或者创建亚太区域多边政治、经济和安全合作机制,以亚太区域多边合作机制为平台,力求掌握亚太区域合作的主导权,主导构建亚太国际新秩序。”<sup>③</sup> 这种努力分别体现在东盟参与 APEC、创建东盟地区论坛、倡导东亚峰会的过程中。<sup>④</sup> 第三,东盟主张的地区秩序结构是以东盟为中心的平面结构,而非等级结构。与美国、中国、日本相比,东盟没有力量优势,但它相信大国间政治上的互不信任赋予了东盟提出合作倡议、发挥引领作用的信用度,而东盟作为亚太地区首个次地区合作组织还享有制定合作规范的道义优势。在一个类似共同体的地区结构中,东盟不是凌驾于其他地区成员之上,而是处在结构的中心位置,其他成员则处在结构的中间层或外层。第四,这个秩序在形态上具有多元特征。东盟本身就是多样性的体现,其成员国在政治、经济、安全和社会文化等方面都存在着较大差异,但东盟就是在尊重多样性的前提下发展起来的。因此在亚太地区秩序的构建进程中,东盟也能够接受多样性,不试图追求秩序形态的单一性。第五,这个秩序是开放和包容的。东盟在决定加入 APEC 时提出的一条基本原则就是 APEC 必须是松散的、开放的和非排他性的。<sup>⑤</sup> 而东亚峰会先后纳入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俄罗斯也表明了其开放和包容的特征。东盟相信,秩序的开放性和包容性有助于维持大国间的平衡和东盟的主导地位。<sup>⑥</sup> 由此可见,东盟所偏好的亚太地区秩序是以安全和经济合作为导向、以东盟为核心的多元的地区共同体。其制度依托主要包括以东盟为中心的地区合作机制(如东盟地区论坛、东盟防长扩大会、东亚峰会、“10+

① 吴心伯:《太平洋上不太平:后冷战时代的美国亚太安全战略》,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36 页。

② 吴心伯等:《转型中的亚太地区秩序》,第 185 页。

③ 吴心伯等:《转型中的亚太地区秩序》,第 174 页。

④ 吴心伯等:《转型中的亚太地区秩序》,第 174—183 页。

⑤ 吴心伯等:《转型中的亚太地区秩序》,第 177 页。

⑥ 吴翠琳(Evelyn Goh)指出,东盟在塑造地区秩序时采取了大国的全方位套入(omni-enmeshment)和复杂的平衡(complex balancing)的策略,即让所有的大国参与地区事务并遵守相应的规则,同时通过相互竞争的机制化和外交手段创造主要大国在地区范围内的权力平衡。参见 Evelyn Goh, “Great Powers and Hierarchical Order in Southeast Asi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32, No.3, 2007/2008, p.154.

3”合作机制、RCEP)和 APEC 等。

东盟主张的亚太秩序规则主要包括合作、平等、协商一致、平衡、开放包容等。东盟是为了推动东南亚国家间的合作而成立的,在后冷战时代它又努力将安全 and 经济合作扩展到亚太地区。东盟希望通过开展各种层次、各种形式的合作来促进安全和发展。东盟的中心地位也只有在一个合作的地区进程中才能体现出来。作为中小国家的联合体,东盟追求平等。这既体现在对主权原则(不干涉内政)的坚持上,也体现在同大国的互动上:由于在力量对比上处于劣势,东盟谋求在合作进程中发挥引领作用,以纠正力量对比的不平衡所可能导致的不平等地位。协商一致是“东盟方式”的重要内涵,<sup>①</sup>它首先体现了对差异性的尊重,在成员国之间存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巨大差异的条件下,只有通过协商、自愿而非强求一致才能使合作进程可持续推进。协商一致也反映了亚洲国家总体上对松散而非严密的“软地区主义”的偏好。平衡作为一种秩序规则,既反映出东盟要使大国之间相互制衡的意图,也体现在东盟与各大国之间关系的平衡(不在大国间选边站),还表现为在地区合作中安全要素与经济要素的平衡,与中国偏重经济、美国偏重安全不同,东盟希望经济和安全并行成为地区秩序的两大支柱。最后,如前所述,秩序的开放性和包容性有助于维持大国间的平衡和东盟的主导地位。值得注意的是,开放包容并不意味着加入合作进程是没有门槛的,这个门槛就是接受东盟的中心地位和东盟确立的相关规范。<sup>②</sup>因此开放和包容是以不损害东盟的主导地位为前提的。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国和东盟的亚太秩序观之间存在着较多的相似性。二者都更加重视秩序建构的经济逻辑,都主张秩序的包容性和开放性,强调平等原则,注重协商一致等。更重要的是,中国和东盟的亚太秩序远景都反映了对地区共同体的向往,不过中国更强调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重点在于加强地区成员的共同体意识和利益层面的联系,不突出制度安排;东盟则既注重共享观念和共同利益,也重视制度安排。总体而言,中国与东盟在地区秩序观上的相似性是“亚洲方式”或“亚洲经验”的体现。<sup>③</sup>

亚太地区秩序的变化是 21 世纪国际秩序变化的重要表现。与 20 世纪相比,21

<sup>①</sup> Amitav Acharya, “Ideas, Identity, and Institution-Building: From the ‘ASEAN Way’ to the ‘Asia-Pacific Way’?” *The Pacific Review*, Vol.10, No.3, 1997, pp.328-333.

<sup>②</sup> 例如,东盟确立的“10+3”合作之外的国家加入东亚峰会的条件是东盟的全面对话伙伴国、必须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必须与东盟有着密切的实质性关系。“据此,东盟可有选择地批准与东盟利益和关系密切的其他国家参加东亚峰会而不受地域因素的影响。”参见吴心伯等:《转型中的亚太地区秩序》,第 176 页。

<sup>③</sup> 郑先武:《“亚洲安全观”制度建构与“中国经验”》,载《当代亚太》,2016 年第 2 期,第 6—13 页。

世纪国际秩序的变迁具有新的特点。首先,20 世纪的秩序变迁主要是由战争(两次世界大战)或重大的政治事件(冷战终结、苏联解体)驱动的,而 21 世纪国际秩序的变化则主要是由经济因素推动的,经济发展导致力量对比的变化,形成新的力量格局和治理秩序。其次,当下和今后的秩序变革不是完全颠覆旧的秩序、建立全新的秩序,而是通过补充、改良的手段,不断引入新的元素,丰富、发展现有秩序,秩序变革具有继承性、渐进性与和平性。最后,20 世纪的国际秩序本质上是西方特别是美国主导的,尽管这是由当时的力量对比决定的,但不公正、不合理的因素显而易见。21 世纪的秩序变革正在和将会进一步提升东方的地位与影响力,也会使发展中国家的发言权大大增强,国际秩序安排也因之更加平衡、合理。

从亚太地区看,秩序的变迁将主要由中国、美国、东盟三个行为者的偏好和政策行为驱动,其最终结果将不会完全反映任何一家的偏好,而是三者互动的结果。由于中国力量和战略能动性的增长以及东盟共同体的建成,由于中国和东盟在地区秩序上存在相同或相近的观点,塑造亚太秩序的亚洲驱动力(中国和东盟)将大于太平洋驱动力(美国),这也意味着未来的地区秩序形态将比当下带有更多的亚洲印记。在地区安全形势不发生结构性重大变化的情况下,驱动亚太秩序演变的经济逻辑将会进一步强化,<sup>①</sup>霸权的成分进一步下降,<sup>②</sup>秩序结构更加平面化,平等性上升,合作性增强。与地区格局的变化相适应,亚太秩序将呈现为一种多元复合的地区共同体形态。<sup>③</sup>

## 六 结语

亚太正处于冷战结束以来最重要的格局变动时期。随着地区成员之间的政治、经

① 事实上,一些学者和战略分析家都注意到这一点。例如,唐彦林认为,“东亚国家一体化合作将首先集中在经济领域,而后再逐渐涉入政治和安全及外交领域……东亚共同体将主要是一个经济联合体,与政治、安全合作体”。参见唐彦林:《东亚秩序变迁中的中国角色转换》,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123 页。鉴于东亚在亚太格局中重要性的上升,东亚的变化轨迹势必影响到亚太格局演变的趋势。沈大伟认为,亚洲有可能出现一种复杂相互依存的地区体系,它不是围绕安全事务形成的,而是基于全球化时代国家之间形成的经济、技术和其他联系的密集网络。参见 David Shambaugh, ed., *Power Shift: China and Asia's New Dynamics*, p.16。作为现实主义战略家的基辛格在谈到亚洲秩序和中美关系时强调,“军事力量不应被视为力量平衡的唯一决定因素,甚至不应算作首要的决定因素”;“美国与中国之间的决定性竞争更可能是经济竞争、社会竞争,而不是军事竞争”。参见亨利·基辛格著,胡利平等译:《世界秩序》,北京:中信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303 页;亨利·基辛格著,胡利平等译:《论中国》,北京:中信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334 页。

② 近年来关于“美国主导的自由霸权秩序”或“美国世界秩序”的讨论,笔者尤其赞成阿米塔·阿查亚的分析,参见 Amitav Acharya, *The End of American World Order*, 2014。

③ 沈大伟在讨论未来亚洲地区体系时,认为它将是一种“多纹理(multitextured)”“多层次(multilayered)”的混合体系,包含了“轮毂—辐”模式、规范共同体模式和复合相互依存模式的元素,并隐隐约约带有均势模式的成分。参见 David Shambaugh, ed., *Power Shift: China and Asia's New Dynamics*, p.17。

济、社会联系更加紧密,互动更加频繁、有力,共享的合作机制和规范建设更有成效,亚太意识会更加强化,亚太地区身份会更加明确。亚太经济总体上继续保持充满活力的发展、相关国家之间(如中美、中日)力量对比的变化、一些重要行为体奉行更加能动的战略与政策等,都会加快地区格局变化的步伐。在这一历史性的转变过程中,中国作为关键行为者的角色更加突出,它在力量、观念、制度方面的塑造作用会不断增强。与此同时,一些国家对中国崛起的反应,无论是适应、调整,还是对冲、制衡,既影响中国的地区行为,也影响地区格局。作为地区首要的行为者,美国的走向同样值得关注。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意味着美国的亚太政策进入了以应对中国崛起为主旨的时期,这对地区格局的演变产生了重要影响。然而,特朗普的执政又给美国的亚太政策带来了新的变化。特朗普的亚太政策问题导向特征(即解决当下关心的主要问题,如朝核问题、贸易逆差问题)更突出,而结构性特征(即关注巩固美国的亚太主导地位,塑造对美国有利的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格局)弱化。但是,不排除在特朗普任期内或其结束任期后,美国亚太政策重回奥巴马时期政策轨道的可能性。经验表明,美国的实力地位变化、对外关切的优先性以及执政者的理念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其亚太政策的走向。美国亚太政策的走向不仅会直接作用于地区格局演变,还会通过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其他国家的地区政策与行为,间接地作用于地区格局变迁。

中国要在亚太大变局中发挥引领和塑造作用,力量是基础,战略选择是关键。首先要确保中长期内(今后5—10年)综合国力的稳健增长态势,其次是在战略选择上把主观优势与客观趋势较好地结合起来,长袖善舞,顺势而为。中国的亚太政策要立足经济逻辑,将地缘经济目标置于地区政策的优先位置。要加强经济力量的战略运用,提升战略运筹的经济取向。同时,要注意补安全短板,在周边和地区安全事务中发挥可见度更高、更有成效的作用,要以新的思维、理念和方法来处理传统与非传统安全挑战,特别是对复杂的领土和海洋权益争端,要运用21世纪的智慧来应对。在地区秩序的塑造上,要坚持发展、合作的功能定位,秉持开放、多元、一体的宗旨,持之以恒地推进地区共同体目标。最后,在中国力量快速增长和利益目标不断扩大的背景下,要注意力量优势的合理运用和平衡相关的利益诉求,提升制度建构和规则制定的能力,真正显示出中国作为新型大国的风范。

(截稿:2017年5月 责任编辑:王鸣鸣)